“人的文学”文艺观念赓续及当代性嬗变
——小说《雪山大地》中“理想人间”建构的重要实践

袁昊

摘要: 现代“人学”观念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而当代作品中的对于“理想人”“人间感”的再叙述，都表现出与现代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的文学”文艺观念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切实的转变，文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基石，必须要同行与时代且在发展中调整和丰富。本文以当代小说《雪山大地》为例，试图辨析“人学”观念当代性嬗变在作品中的具体实践，为文艺观念“当代性”嬗变的问题提供参考。同时，作品呈现出中国新时期以来草原地区的发展进程和地域风貌，饱含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切关照，回应时代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诗学魅力。

关键词：《雪山大地》；“人学”文艺观；当代性嬗变；理想建构；温暖现实主义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Human Liter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Evolution: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Constructing the “Ideal Human World” in the Novel *Snow Mountain and Great Earth*

Yuan Hao

Abstract: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study of humanity” (renxu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literary creation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le the re-narration of the “ideal human” and the “sense of the human world” in contemporary works exhibits creative tendencie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era.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human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concret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s; a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literary concepts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be adjusted and enriched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ontemporary novel *Snow Mountain and Great Earth*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ern the concrete practice in the work of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tudy of humanit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ques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gional features of the grassland areas since China’s new era, imbued with profound concern for society and life, responding to the times while also displaying a unique poetic charm.

Keywords: *Snow Mountain and Great Earth*;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the study of humanity”; contemporary evolution; ideal construction; warm realism

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其恢弘的气魄铺开一幅社会发展的创业图卷，回望半个多世纪以来草原儿女几代人的奋斗与拼搏历史，人物的成长与历史的发展相遇于雪山大地，谱写出一曲动人的壮丽赞歌。在故事的情节递进中，以“我”的视角徐徐展开，以此在“草原”与“西宁”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中形成链接，探寻出宏大叙述与民间叙事巧妙结合的新范式。个人意志与时代话语成为其历史叙述的两翼，表达出作者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深刻思考。在以作者故乡为原型的文学世界中，他将自己的亲历、感悟、理想转变为文学现实，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美好世界中建构独具当代性的“理想人间”。

这种当代的“理想人间”建构并非空中楼阁，作者在作品中指出了走向其的路径：正视“人”从而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塑造合乎时代的“理想新人”；重视“人”的生活，让自然健康的“理想人”自然地去爱和生活；认同“人”的情感，在合乎人性本源的基础上，引人向上、走向至善。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且已经在“雪山大地”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的道路，是“人的文学”文艺观的深刻赓续与实践，同时也呈现出对历史发展的反思和包容。在建构“理想人间”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作者对于“人的文学”文艺观念的充分认同，肯定“人”的存在与价值，也给“人”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其中穿插了关于对死亡的理解、对历史的感受乃至对信仰的论证，都成为作品中无法被忽视的重要课题，纯粹质朴的诗化表达凸显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完善“理想人间”建构的同时，也成就了作品中独特的诗学色彩和温暖现实主义新趋向。

一、“人”的本质及“理想新人”的塑造

《雪山大地》不仅是一部叙述社会发展与国家历史的作品，更是一部承认“人性”，关注“人”的发展的“人学”创作。贯穿于作品中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和“交融”，“人”与“人”因为本质相同而“平等”，因为彼此相爱而“交融”。父亲为沁多草原办起了学校，被收留的塔娃们和牧民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学校中，唱起歌跳起舞来，没有经过事先排练却“好像有一种天然默契的基因，规范着他们的行动，包括举手投足，一唱一和”[①]。在没有被社会等级、物质现实、外界评价浸染的孩子们的心中，彼此之间并无“隔膜”，他们彼此相依、互为伙伴，而这恰与“人的文学”家们的感受不谋而合，“我知道在这异样服装的底下、也藏着一样的精神、一样的身体”[②]。这是“人的文学”关于人间感受的重要开启，也是《雪山大地》中关于“人”的本质、“理想人”塑造的重要表达。作品中多次出现对于“人类生而平等”的叙述，并对未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人们给予了高度关注，在物质基础相对匮乏的草原的更为偏远的“生别离山”，住着被所有人遗忘的麻风病人，当父亲母亲见证了饱受病痛、饥饿、寒冷折磨的他们，呆愣着惊叹：“瞧瞧啊，他们也是人？”[③]这不仅是父亲母亲的惊叹，也是作者对在外面城市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未曾被开发地域的、深受生活之苦的兄弟姐妹投去的温情一瞥，于是他将“母亲”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为“非人生活”的同胞们带去希望的火种。

桑杰的人物形象变迁，既是作者对于如何培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年，第 86 页。

② 仲密（周作人）：《京奉车中》，《每周评论》1919 年 4 月 13 日，第 17 期。

③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247 页。

养“理想人”理念的重要实践，也表现出当代文艺独特的叙事范式。父亲第一次见到桑杰时，他“还没走到跟前，就弯下腰去，两手朝前抬起，半张着嘴吐出了舌头”[①]。这种明确的下人见到老爷的行礼动作，以及对于父亲想帮助他们时所说的“要是你嫌搬家动作慢，就请用鞭子抽我们”[②]，都表现出桑杰本人对于“不平等”和“非人”生活的习得性顺从。对于心怀“平等”的父亲，“桑杰还是不敢坐，木讷呆痴的脸上又增添了一层惶恐”[③]不禁让人联想到鲁镇中那个“脸上虽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④]，被苦难压迫得近乎木讷的中年闰土。而在父亲表现对于雪山大地神的尊敬后，桑杰一家开始有了转变，“尊重里掺和着发自内心的亲切和信任”[⑤]，更会在父亲离开时心怀担忧。草原公社完全建立完成后，桑杰被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话语权，他冰封的心逐渐融化，开始接受外界的善意并给予反馈。“他敬重父亲，把帽子脱下来塞进胸兜，然后屈膝，躬腰，两手平伸：‘你好你好’。”[⑥]乃至后期桑杰身兼数职，成为沁多草原运转的重要人物：学校校长、公社主任、畜牧产品站负责人，在桑杰个人地位的不断提高过程中，他的木讷、呆板、卑微等“非人”的特性逐渐消失，开始与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积极融为一体。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回“人”，而这种“人”便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期待塑造的“理想新人”，也是作者笔下“理想人间”的重要建构者和实践者。

“好藏族人”的评价对洛洛来说何其重要，当听到父亲的关于“你不是一个好藏族人”的批评，洛洛“只是感觉到刺激的锋芒梭镖一样猛烈地扎向了心底”[⑦]，于是迅速地接受批评、放下所有事情准备回到央金的身边。这种论述这本质上便是对是否是个“好的人”的评判，一种天然的、发自内心的引领与约束，超越于律法之外，形成了对于“理想人”的最好塑造。在“我”与梅朵的婚礼上，达娃出现在了婚礼现场并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惊叹于时光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改变，“岁月的流逝绕开了她，不管水浅水深水清水浑，她都是中流砥柱的那座少女石”[⑧]，在此时的叙述中，达娃的形象仿佛附上了一层光芒，她“一点点都没变”意味着对于物质和杂念的摒弃，平和坚定地穿越世事的繁杂和苦难岁月，此时的达娃也给“我”带来了一些神圣而纯粹的感受，侧映出作者本人对于人的“神圣感”的思考。“伊伶俐的身材，停匀的脚步，和那白色的脸儿，端庄，陈静又和蔼”[⑨]，这种对于审视身边人类兄弟姐妹而产生的“神圣感受”，“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十年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在多数新文艺家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与感情上均留下了深刻的印痕”[⑩]。在百余年后的作品中再次复现，并形成了作品中关于新时代中的“理想人”的重要形成基础。

“现代人道主义者判断，导致人类社会迄今未能实现‘理想的人’与‘理想的生活’的最根本的病原，便是人与人之间不自然的‘隔膜’状态”[⑪]，在作品的叙述中多次出现了关于“人”的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 页。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6 页。

③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4 页。

④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2005 年版第 1 卷，第 508 页。

⑤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11 页。

⑥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123 页。

⑦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53 页。

⑧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39 页。

⑨ 朱自清：《人间》，《小说月报》1921 年 8 月 10 日，第 12 卷第 8 号。

⑩ 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34 页。

⑪ 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第 115 页。

“ 交融 ” 的叙述，这是对实现 “ 理想人 ” 目标的重要实践，父亲收留的塔娃们和牧民的孩子们在沁多学校彼此熟悉、再无间隙；“ 我 ” 与藏族兄弟才让间虽无血缘却胜似亲人的手足之情；角巴、父亲、桑杰的家人们形成一个团结、交融的大集体；甚至后期大家的语言、血缘、饮食、服装、文化都走向了一个完全的 “ 大融合 ”。这同样也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在藏族孩子们组成的队伍四处慰问演出的时候，吃到了各种汉族的食物，藏族老军人对于年轻藏族孩子 “ 吃鱼 ” 的行为，刚开始是 “ 瞪着残羹冷炙 ”，随后又 “ 摆了摆手 ” 并安慰孩子们。饮食是地域文化价值观的具象化呈现，当维持生存的原始 “ 吃 ” 的本能趋于 “ 融合 ” 后，进一步的 “ 交融 ” 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 “ 融合 ” 决不是为了要实现 “ 统一 ” 的形成规训，是极具特色个体间非 “ 特异化 ” 的深度链接，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其中对于藏服和军装的描绘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 ” 因为有一身扎实的藏服和藏刀而感到幸福，藏民孩子们也身着军装在众人面前神采奕奕，互相认同彼此的文化并让自身更加 “ 完善 ” 是作品中对于 “ 理想新人 ” 塑造的重要实践。

“ 随心所欲、不逾矩 ” 是 “ 理想人 ” 生活于这世间最舒适的姿态，“ 天赋就是天然而自发的中规中矩 ” [①]，作品中对于 “ 理想人 ” 本身的特质予以充分的肯定，并对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成长的空间，当代 “ 理想人 ” 就是在摆脱偏见和贫苦后的走向 “ 交融 ” 的人，这既承载着对于 “ 人 ” 的本质的深切思考，也包含了对于中国筚路蓝缕历史发展的肯定。“ 理想新人 ” 形象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建构，作品中是以一个既定成功的 “ 父亲 ” 和 “ 母亲 ” 的正面形象，引领着相对落后的沁多草原的一切大步向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父亲 ” 和 “ 母亲 ” 就是作者笔下的 “ 理想新人 ” 的代表，他们直面生命的、人的本质，更关注自己与时代的密切联系。他们二人情感的加深都是建立在相似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上，甚至因为彼此热烈的建设情怀而更加亲密，母亲准备奉献于生别离山的医疗事业时，这种志向 “ 引起了父亲的冲动，不过前者是事业的，后者是生命本身的 ”[②]，“ 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 ” [③]，此处所呈现出的 “ 当代性 ” 特色是毋庸置疑的，《雪山大地》绝不是脱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作品，它隐含着作者对 “ 理想人 ” 的殷切期盼，也忠于自身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态度。

二、“人”的生活及“人间感”的再叙述

“ 理想新人 ” 形象得以塑造的基础上，作品进一步对 “ 理想新人 ” 的生活作出了充分描绘，并对 “ 人 ” 与 “ 自然 ”，“ 人 ” 与 “ 众生 ”，“ 人 ” 与 “ 苦难 ” 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寻找到了 “ 人 ” 在世界中与外界相处的初始方式，这是对于 “ 人的文学 ” 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现代 “ 人学 ” 主义者确定了 “ 人间感 ” 基本内容，当代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将其落实了到真实的生活与时代中。当代的 “ 人 ” 的生活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课题：人如何与 “ 自然 ” 相处；“ 人 ” 如何与 “ 他人 ” 相处；“ 人 ” 如何与 “ 苦难 ” 相处。与 “ 自然 ” 如何相处是立足于 “ 人 ” 是 “ 自然 ” 中一个部分的角度来叙述 “ 人间感 ”，作者推崇的态度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而非 “ 战胜 ” 的。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 “ 人 ” 的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204 页。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250 页。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 年第 3 期。

生活的新思考，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临的课题，作品中包含着大量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人与草原动物的相处片段，和谐美好的画面中，向读者展现出“人”的生活中与自然相处的理想方式。骏马日尕贯穿作品的重要动物，父亲第一次与角巴交谈也是因为它，并对马肉、马精、马神、马心都作出了细致的描绘，这匹无可挑剔的马在与父亲一次次的合作中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某些时刻甚至不需要发出指令它便已经开始落实父亲的意愿，在父亲与日尕的交往中，折射出的是“人”作为自然生灵中的一员，与其他生物间的互动与交流。“人类本是自然界一小部分，所以就人化了他”[①]，父亲与日尕、牧民与藏獒、动物与草原其实映射的是“人”与“自然”间的密切联系。

与众生平等交流的，而非“压迫”。这是“人”的生活中“人间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见证了汉藏融合大家庭的形成历程，也更加坚定了自身对于“个人”社会身份的认同，即与“他人”平等交融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各美其美”，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汉藏两地自然风光、服装、生活日常的描绘，西宁生活的城市里的人们和草原上自由的牧人们，都在自己的舒适区内生存繁衍，尊重自身的文化并沉浸其中，是“人”自身与外界“交融”的基础；其次是“美人之美”，作为藏区工作者的父亲对于雪山大地的信仰和牧民们的本性，乃至洁白无瑕的哈达、草原上美丽的落日、风雪中栖息的雪窝子，都深深地吸引着父亲。他在与雪山大地的深切交往中，愈发将自己视为藏族人民的一分子，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父亲对于藏族文化的信仰的向往与尊重。“美美与共”是“人”与众生交往的最终指向，“过去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渴望合群共生、平起平坐的人，被疏离，被不同，被另类，被重视以及被特殊化，都不是我希望的”[②]。欣赏作为个体的“他人”而非“压迫”，并在融合的、舒适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形成更加团结的、完备的文化，是“人”与众生交往的最高要义。

与苦难坦诚相对的，而非“逃离”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个体生命感醒悟”的具体写照，这是对于“理想人”生活理念的重要丰富，其中着包含对“死亡”“天灾”“生命”的重要思考，作者所记录和描绘关于几代人发展过程中历经的苦难，包含着对于国家发展建设时期曲折道路的回顾，而其中所隐含的“生存哲学”也成为人物塑造的关键一笔。故事出现了几次关于“死亡”的感受，赛毛为了营救即将被洪水冲走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丈夫桑杰得知其死讯后“没有哭，也不让孩子们哭”[③]，因为眼泪会阻止亡者灵魂的离去。人生七苦，死亡其一，这种对于“死亡”的宽和情绪夹杂着宗教意识，成为藏族人们面对人生苦痛的生命智慧。姜毛因为记挂保育院的孩子们而独行途中，遇到狼被害，愧疚使父亲无法面对姜毛的亲人们。而她的丈夫角巴尽管充满了不舍和痛苦，却充满了释怀和乐观的情绪，认为“她前世是一只老虎，咬死过许多狼”，如今还上了账实在是一件“好得很”事情。在对待“死亡”这件痛苦事情上，雪山大地庇护着的人们总是保有最真诚的情绪，痛苦、不舍但不悲观，他们将“人”看作是自然界中的一环，从自然中来，再回归自然。面对被大雪冻死的牛羊，牧民们同样也包含着回归自然的态度，“保持良心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的尸体变成另一种施舍……而食肉动物吃了这些施

① 俞平伯：《俞平伯来信》，《新潮》1920 年 5 月 1 日，第 2 卷第 4 号“通讯”栏。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109 页。

③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16 页。

舍的牛羊，就不会再去吃别的小动物了”[①]，“人”与动物都是草原系统运转的一个环节，与万物共生。

与“苦难”的坦诚相对和对于“死亡”的真诚态度，激发了“非人”者的生存意识，作品中的“死亡”也与“新生”密切联系，成为生存过程的一个步骤。如果没有赛毛的奋不顾身就没有江洋与才让紧密联系的大家庭，如果没有姜毛的无私奉献就没有保育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大集体，人们在不断“交融”的过程中走向“死亡”和“新生”，并在大自然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对于“苦难”的叙述中，作者对“自然中的苦难”和“社会中的苦难”保留着同样的坦诚态度，在亲人们四散分离、被误解被迫害的年代过去后，大家因为再度相逢而流泪，但父亲“没有流泪”，“带着疼痛的沉默让他就像一座从远古的风霜里走来的山”[②]，这也是作品中对于“人间感”的重要拓展与再叙述。这种对于“人间苦难”的坦诚态度是“理想新人”当代性的重要体现，人文社会带来的苦难并非避而不谈，而是站在更高的视角对过去的岁月给予坦诚的反思，更进一步引导读者思考真正的“理想人间”的存在。

在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苦难”相处的基本态度和理念后，围绕“人”的基本生活与当代“人间感”的叙述已基本完成，进而对“人”的更高追求即“人”的情感和信仰作出论述，在塑造“理想人间”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予以更高纬度的期待。在对于当代“人间感”的具体描绘中，交通工具的变化也见证和车承载了“人”的生活的转变。故事开启于建国初期的公社化，停笔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贯穿其中的除了以“父亲”为主导的三代建设者的艰辛，还有不同时期的社会景观，这也是当代“人间感”变迁与充实的一隅。以逐渐取代马匹的“摩托车”为例，桑杰作为底层牧民崛起的重要代表，刚开始对摩托车的态度是“小心翼翼地问；‘摩托车’是什么”，最后转变至藏民家庭中第一个学会骑车的人，以摩托车的声音为例……见证了雪山大地这样一个尚未城市化的地区走向现代，自然与城市、牧场与高楼、骏马与摩托，这些多重景观的杂糅，构建了独属于国人的时代发展美好途经。饮食的包容、穿着的包容、精神的包容最后走向了文化的交融，“变迁”并不意味着“被取代”，而是万物在其所需所在的位置发挥其得当作用。

三、“人”的情感及“理想人间”的当代构建

新世纪现代人道主义者确立的现代人道主义文艺是“‘人的文学’的‘情感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及基本准则”[③]，这也是作品关于建构当代“理想人间”关注的核心。在整部作品的叙述中，关于内心情感的独白并不算太多，更倾向于通过人物的对话和情节的递进，来突出人物性格、传达内心情感。人物语言成了关键因素，在与藏族同胞的大段对话中，前缀的大量语句成为发言人核心思想的重要传达，形成了类似古典艺术中“起兴”的艺术效果，也成就了《雪山大地》创作的“平民性”特征和“人学”主义色彩。在理解文艺“平民性”的基础上，俞平伯进一步“认定人类最普遍的情感还广泛存在于民间艺术的创作，即‘民间底诗’当中”[④]。在作品的大量对话中都包含着这种略带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78 页。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01 页。

③ 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第 71 页。

④ 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第 84 页。

古老元素的表述与歌词，呈现出独特的诗学美感。如父亲第一次和角巴见面时，角巴描述其划分草场的艰辛：“西一个日头落，东一个太阳出来，我的这个头，昨天迎南风前天迎北风……”[①] 在朴质而生动的叙述中，听者的仿佛能跟随其描述具象出一个披星戴月的牧人形象。语句中的意象如“日头”“山”“太阳”“风”等都是自然界中极为普遍的场景，也不十分注意韵律的齐整，却质朴生动、符合逻辑，达到一种自然生发的表述效果，这便是“民间底诗”的艺术魅力，作家在这片满载个人情感的雪山大地中，寻找了民间与时代的巧妙融合，并将这些具有“民族性”和“未同质化”的平民艺术通过对话的形式呈现出来，也隐含着其个人对于“民间底诗”的独特审美向度。

除了对话之时独具民间“起兴”艺术的叙述，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也是这个“理想之域”建构的重要基石，从中也能读到歌唱者最质朴纯粹的情绪。在父亲第一次见到出身贫困、身世坎坷的赛毛时，注意到她喜欢唱歌，“只要唱起来就是悲伤的音调、忧愁的歌词，似乎骨子里有一种力量，要让她止不住地把苦难从以往延伸到现在又推及未来”[②]。身为塔娃的桑杰夫妇他们在草原上过着最卑贱的生活，不与人交谈、不会文字，于是歌唱成为她汹涌着的内心情绪和灵魂的出口：

草原的长河是冰雪喂大的，
今天的眼泪是从前积攒的，
长河的尽头是我看不见的，
前世的冤孽大人是不说的，
苦日子的眼泪是淌不干的，
我心里的悲伤是说不完的。

“草原”、“长河”、“冰雪”等质朴的意象共同形成了赛毛简朴的世界观，在这些触目可见的自然意象中叙述着其痛苦、哀伤和情绪，抒发着内心无人理解的忧思，听其声、感其情，人类的情绪不再是一泓自己苦酿出的死水，而是一条可以流动的深入人心的长河。一首首从大自然中来、从生活中自然生发的歌曲、谚语都具备引人共鸣的“诗化表达”，恰如“人的文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诗底素质是进化的，故是自由的，诗底形貌是还原的，故是普遍的”[③]。正因为诗歌中那些质朴而真实的自然意象，不加修饰的真诚的情绪，不经雕琢的纯粹的理念成就了这些诗歌深入人心的震撼力量。

而这种力量是作者笔下构建当代“理想人间”的基石，隐含于其创作过程中自然纯粹的审美向度和叙述理念，并在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中，被赋予更多的符码意义，成为文化、感情、习俗乃至信仰的代表，出现在主人公生活的每个历史节点。《卖报歌》的几次出现与变化都是很值得关注的，第一次出现在桑杰和父亲关系亲近时，父亲哼唱的《卖报歌》曲调的“唵嘛呢叭咪吽”，这首民间歌谣无论是在取材抑或是立意上，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却在汉藏文化融合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编和加码甚至汇入了“扎西德勒”的祝福词。这首根据汉族孩童真实故事改编的歌曲，并与早期的解放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首歌有意强化了“父亲”的建设者形象，也在民间叙事的缝隙中填充进了时代和主流文化的血肉。歌曲哼唱到后面，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调味和情绪表达，对于汉藏文化融合趋向的真实写照，乃至对于“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的交融，都伴随着歌曲的不断改编被书写于这段建设历史中。粉碎“四人帮”之时，洛洛和央金的婚礼上，梅朵唱起新填词的《祝酒歌》：“看你像个杨子荣，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2 页。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7 页。

③ 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诗》第 1 卷第 1 号，1922 年 1 月 15 日。

一气喝干一大桶；看你像个座山雕，敬酒不吃吃罚酒。”[①] 此处含有明确的时代特性，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已经成为特殊年代的文化符号，“杨子荣”和“座山雕”的时代犹在眼前，成为梅创作的重要取材内容，也表现出梅朵作为藏族人的文化“融合”倾向。

草原公社化基础完成之时，旺姆劳作时哼唱起《挤奶歌》：“请问亲爱的牦母牛，洁白的奶子哪里来？牦母牛张嘴笑哈哈，洁白的奶子草原来。”在歌曲简单朴质的自然意象中，已经可以感受到政策变化、时代发展给藏民们带来的切实感受。《黄马儿》中描绘牧人骑马飞驰、快意人生时所见的美好景观；《斗狼歌》中描写人们与狼群作斗争的，鼓舞劳动人民生存勇气和斗争精神的唱词。劳作者享受其劳作，依托自然、自在生存，与千百年来赖以农业生存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期待重合，作者笔下的“理想世界”也在一次次的、以自然和劳作为意象的歌曲和诗句中得以更完善地构建，也是改造和仍存在的“苦难世界”的方式。正如“我”所思考的那样，牧场和草原的生活其实并不富裕甚至有些贫瘠，家人们的一生也并非顺遂而是充满了无法预料的事件，但生活在这片净土的人们仍然唱着、跳着，“相信祈祷的力量，相信雪山大地的照应，竟是这般神奇地左右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敢于乐观地面对一切灾难”[②]。这种“忘我”的力量便是“爱”所带来的奇迹，通过歌声、舞蹈这些最原始的艺术语言进行表达，直接坦诚，也充满着神性色彩。“人的文学”家们在对于“人间性”发现的叙述中常通过“佛教徒的幡然醒悟或种种方式的彻悟”来进行呈现，在《雪山大地》的叙述中开始侧重于不断地“感化”和“引领”，即在坚持共同“至善”理念的前提下，“人”不断走向“交融”，最后形成一个无隔膜的、完全自在的“理想人间”。

以“我”的情绪变化为例，作为“理想新人”父亲和母亲的后代，“我”的“人间感”的觉悟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外界不断地刺激和引导中完成的。面对突然加入“我”的家庭的才让兄弟，“我”朦胧地意识到他对我的生存资料、生存空间和长辈之爱的分享，表现出一种孩子式的嫉妒和排斥心理，生成了一种“可以用残忍来形容的优越和歧视”[③]，但随着深入的相处，“我”的手足之情和同胞之“爱”在情感的互动中逐渐生发，并将才让视为并无血缘的亲人、不分你我、信仰的共同带来了信任和共生，“嫉妒”“怨怼”“痛苦”等情绪融汇于雪山大地中，杂糅出奇妙的“至善”情绪。在作品十七个章节的推进中，贯穿其中的是雪山大地发展不同阶段的诗歌，其中恒久不变的“扎西德勒”既是作品对于主人公故事的美好祝福，更是“至善”力量传播的重要方式，成为“理想人间”建构的重要基石。“理想人间”的建构除了需要当代社会“理想人”的存在和“理想生活”的存在，最核心的关键便是“向善而生”。正如“我”在回望和思想这个藏汉融合的大家庭时，发出来这样的感慨：“如何才能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藏汉混搭的家，真是说不清啦。它有感情、习俗、婚姻、血液的交融，还有声气呼吸的交融，而一切交融都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向善而生。”[④]“人的文学”家们在文艺观念建构的初始阶段，“根据已发现的‘真艺术’的本质特性先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275 页。

②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63 页。

③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4 页。

④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 349 页。

生。”[①]“人的文学”家们在文艺观念建构的初始阶段，“根据已发现的‘真艺术’的本质特性先的文学”家们在文艺观念建构的初始阶段，“根据已发现的‘真艺术’的本质特性先行建构新形态的理想文艺”[②]，在此刻得到了重要实践，并真切地落实了“‘真艺术’/‘好的诗’的‘感人向善’的天然效用，推动社会迈向理想之途”[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五四文学思想的传统资源及其变革研究”(21AZD138)]

作者简介：

袁昊（1999—），湖南邵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349页。

② 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第87页。

③ 同注②。